

叶倬玮 著

翁方纲诗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叶倬玮 著

翁方纲诗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翁方纲诗学研究/叶倬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61 - 2699 - 8

I. ①翁… II. ①叶… III. ①翁方纲(1733~1818)—诗学—
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6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n.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国球

1935年12月6日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版上，刊载了陈世骧《对于诗刊的意见》一文；这是现今可见的少数陈世骧早期诗论著述之一。文章主要提出新诗的发展需要“批评”的辅佐，以抉发诗之所以为诗的“基本要素”——一种可以“代表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的理想的话语；他认为要把这个基本要素分析明确，才可以“决定一篇创作是否是诗”。文中以卞之琳与臧克家的两首诗作语言分析，就其中的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情思是否能达至“绝对和谐”，来解说“诗人与常人”、“诗情与非诗情”之别。

这篇诗论立即吸引邵洵美的注意，在《人言周刊》发表《新诗与肌理》（1935年12月21日）一文以为响应。邵洵美认定陈世骧之说受了英国诗人西脱惠尔（Edith Sitwell, 1887—1964）的“texture”一说的影响。邵洵美指出西脱惠尔之说的重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非特对于字的意义应当明白，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字的声音、颜色、嗅味、温度，都要能肉体地去感觉及领悟。”他还特别提到钱钟书曾译“texture”一语为“肌理”。钱钟书早在1933年10月5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版发表的《作者五人》一文中提到Edith Sitwell这个术语，却只译作“纤维组织”；至两年后的一篇书评（评温源宁《不够知己》，载《人间世》1935年第29期）他再提到同一个术语，译为“肌理”，并加按语说：“这是翁覃溪论诗的名词”；邵洵美应是看到这一篇书评而加引用。事实上，钱钟书对“texture”一词很感兴趣，后来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载《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4期）一文更作出发挥，说：“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

出‘肌理’，……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蕙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在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稍后邢光祖又发表《论肌理》一文（《读书生活》1942年第1卷第2期），就翁方纲与 Sitwell 之说作了不少引申和发挥。经钱钟书的品题以及邵洵美、邢光祖等的呼应，中西方的诗学，就有了对话的机会，虽则对话的场地暂时还只限于中国的土地上；而陈世骧的论说，虽然没有提及“肌理”或“texture”，但都可以在这个对话的脉络中被理解。

这些讨论其实都是围绕着“甚么是诗”、“如何体认诗的特质/本质”等问题所作的思考。自19世纪开始，中国面对西潮的冲击，渐渐发觉无论政治社会以至文化的秩序都需要重新整理；作为中国文学主项的“诗”，由于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而卸下传统的体式外壳，更需要不同角度的“批评”论述以重塑它的性格和体质。西方诗论带着“现代性”的象征意义进入这时期的文化场域，但因为要协商的对象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的“诗”，特别有需要与本国文化传统沟通以求磨合，才能真正发挥秩序重整的作用。钱钟书、邵洵美与邢光祖之论 Sitwell 的“texture”与翁方纲的“肌理”，正是这一型态的文化磨合的表现；四十年后台湾古添洪再以“肌理”与 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 的“structure - texture”观念比较（《翁方纲肌理说与蓝森字质结构说之比较》，《中外文学》1976年第5卷第2期），借以为美国“新批评”进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开路，则又是另一尝试。再换一个角度看，翁方纲的“肌理说”以至其他传统诗论，也正透过这种思考和探究而重新召唤出它在现当代的生命力；可以说，抱持着这种现代意识去研究传统诗论，就不至沦于故纸堆的沉溺，反而是活化传统的义举。

叶倬玮《翁方纲诗论研究》一稿的书题并不眩目，但作者充满现代的问题意识而又有力地作出有理有据的爬梳整比，则是有心的读者所能共见的。作为中国古典诗论的专著，读者首先会关注它在特定课题研究中有没有新的发展，是否建基于具体而周备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其间的论述程序是否细致连贯，其推论逻辑是否合理等等。从书稿所见，叶倬玮显然非常用心于原始资料的搜罗与运用。除了适切地引用《复初斋诗集》的作品

以说明翁方纲对杜甫以至王渔洋的态度，以为下文讨论“神韵”、“格调”等之铺垫，更征用过去年研究者比较少引述的《小石帆亭著录》、《苏斋笔记》，与《杜诗附记》等材料，开拓了讨论的空间，让书中的论证更为充实可信。此外，本书在结构上可以见到章节间的层层推进和呼应；当中剖析翁方纲的“神韵论”，是为了疏解他的“格调观”；阐明翁氏对这两个观念的理解，又可以进一步揭示他的“肌理说”之来龙去脉，以至应用方式。这种层递推进的写法，本应是“专著”撰述之矩矱绳尺，但现今著述却多见为散篇论文之凑合，篇章之间缺乏有机的组织；因此叶倬玮的书写方式，可说回归到学术的正轨。当然，本书的终极指向正在于最后一章——《形式的意义：翁方纲与中国诗学》。表面看来，这一章好像逸离了古代诗论研究范围，部分读者或者会视之为“余论”，但我却认为这是全书命意之所在。

回顾现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其初始就是为了说明过去中国大量的文化文本中，实有符合“现代”观念的“文学批评”论述；于是有“诗文评”是否“文学批评”的热烈讨论。五四以还的学者，经历革命洗礼之后，回头想重新体认民族文化，既想证明新文学的现代合法性，也试图与（合乎现代概念之）中国文学传统相衔接；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如朱自清所倡议，借“西方的明镜”以照见“自己本来面目”。他自己一方面推动现代解诗学，以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剖析古今诗作，撰写《古诗十九首释》、《新诗杂话》等作示例；另一方面用“文学批评”带来的视野，回溯传统的“比兴”、“言志”等论述，写成《诗言志辨》一书；其目标正在于为“中国文学”——无论其为古其为今。因为古今是一个连绵的延续体——在“现代”状况中，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叶倬玮写作本书，也是清楚带着这一种“现代”意识而进行的。基于此，他在剖析翁方纲的诗论时，注意到“心声之更以声传”的重要性；留心到其“格调”观念不仅限“形式”，还包括“诗之为诗”之原理；看到“肌理”如何具有贯通内外的意义，“诗法”是“肌理”呈现于诗之内与外的方式；并指出翁方纲的“肌理说”在应用上所陷的困境。经此疏说，叶倬玮在第七章把翁方纲的诗论置放于现代视野时，可以说是顺流而下，甚至是水到渠成。回看上文提到陈世骧之立说，就是意图在中国新诗成长的过程中建立“诗之为诗”的基准，从语言表现以见“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这与叶倬玮所揭示的“心

声以声传”、“肌理有贯通内外之意义”，其实是类同的省察。再回看 Sitwell 的“texture”论述，可知这个概念其实是“活力与秩序”（energy and order）的静态与动态的连续性结合，其喻依不单单是“纺织物”（garment），也融会了“有机体”（organism）于其中；她对音乐性的重视，目的不止于外在表现，而在于里通上帝之灵魂（God’s soul）；事实上，Sitwell 的“texture”概念，较诸邵洵美所理解的“肉体地去感觉”，或者钱钟书的“纤维组织”与“触觉”，更为深刻（参考 Edith Sitwell, *The Pleasure of Poetry*, 1934; John Ower, “A Golden Labyrinth: Edith Sitwell and the Theme of Time,” 1974）。同样地，经过叶倬玮的疏释以后，我们知到邵、钱二人还未尽得翁方纲“肌理说”的真意。Sitwell 与翁方纲的诗学思想实在还有许多互通之处，有待进一步查察；这些探测又对今天思考“诗之为诗”，甚或“文学之为文学”等重大问题，有不容小觑的意义。由此观之，叶倬玮这一份翁方纲研究，可以为我们打开古代诗学研究的新路向。

倬玮从 2004 年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与我结下师生之缘转眼已有十年。岁月如梭，我们各自都有了许多人生的历练。我有机会看到他在学术路上奋斗、在困逼生活中成长，心中自是欣慰。年来我更相信人间世事，莫非因缘之和合；至缘起缘灭，实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盼望倬玮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在学术上更上层楼；则翁方纲的研究，乃是为未来累累之果实播下的种子。

2013 年 7 月 8 日于八仙露屏下

目 录

序	陈国球 (1)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今人研究翁方纲概述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复初斋诗集》的文学批评阅读	(11)
第一节 翁诗本色的解读	(11)
第二节 以杜诗为“元音”	(13)
第三节 探索渔洋神韵的两种倾向	(17)
第四节 “诗境”的追寻	(25)
第五节 小结	(37)
第三章 解释“神韵”	(38)
第一节 渔洋释“神韵”的方法及其问题	(38)
第二节 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之释“神韵”	(48)
第三节 翁方纲的“神韵”定论	(75)
第四章 “格调”与诗史	(83)
第一节 《石洲诗话》的“格”、“调”说	(84)
第二节 《苏斋笔记》的诗史观	(99)
第三节 《格调论》三篇的“格调”论	(121)
第四节 小结	(128)

第五章 肌理说	(130)
第一节 “肌理”源流考	(130)
第二节 翁方纲肌理说	(135)
第三节 小结	(147)
第六章 “肌理”的应用:诗法论与“杜甫”	(148)
第一节 翁方纲的诗法论	(148)
第二节 “肌理”典范的建立:重塑杜甫	(154)
第三节 小结:“肌理批评”之意义思考	(175)
第七章 形式的意义:翁方纲与中国诗学	(177)
第一节 新诗运动下“肌理”之回归	(177)
第二节 “性情论”的限制与“肌理批评”	(187)
第三节 形式与抒情	(195)
第四节 神秘性的解释	(204)
第五节 小结	(209)
第八章 结论	(210)
附录 引用书目	(214)
后记	(224)

第一章

前 言

本研究题为“翁方纲诗学研究”，主要关注翁方纲进行其诗学构建时，如何对传统诗学的某些部分进行拆解及重建，如“格调”、“神韵”等，并尝试以现当代的相关研究与翁氏诗学对读，一窥其意义。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又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任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降调鸿胪寺卿，年八十六卒。翁于乾隆四十二年入四库馆，参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近二十年。翁氏为著名的金石考据家、诗评家及诗人，著述甚丰，计有《复初斋文集》三十六卷、《复初斋诗集》七十卷、《杜诗附记》二十卷、《苏诗补注》八卷、《孟子附记》二卷、《论语附记》二卷、《小石帆亭著录》五卷、《金元遗山先生好问年谱》三卷、《虞文靖公年谱》、《莲洋吴征君年谱》一卷、《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八卷、《石洲诗话》八卷等。

第一节 今人研究翁方纲概述

翁方纲在乾嘉时倡“肌理”之说，以补“格调”、“神韵”之弊；其本人又写下大量诗作。翁方纲仍在世之时，已有不少人对他的诗作及诗论作出评价。如陆廷枢指翁的论诗要旨在矫正“格调说”的“空疏”及“神韵说”的“寥闕”，诗歌创作则“纯乎以学为诗”^①。此评论思路一直

^① 陆廷枢：《复初斋诗集序》，《复初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影响至今。陆氏之评语尚算中肯，没有过誉或过贬之辞，后来《清史稿·翁方纲传》亦援引其语^①。不过，对翁氏的诗作的评价却更多流于两极。誉之者谓之才力雄富，别开生面，能继承诗教，如张维屏、徐世昌、陶梁等^②。这是就翁方纲诗歌重学、重材料的特征而言。至于批评的声音亦很多，较早的有袁枚，他批评翁方纲的诗“误把抄书当作诗”，缺乏“性灵”之作^③。翁氏的好友洪亮吉亦指他的“性情诗”太少^④，后来刘声木更说翁氏的诗：“爬罗梳剔，诘屈聱牙，似诗非诗，似文非文，似注疏非注疏，似类典非类典”，因而流传稀少，“欲供插架而未能”等^⑤。翁方纲的诗风较独特，不易受到欢迎，亦很容易被解读成与性情对立的方向；虽然，翁氏之论并不与性情对立，他反而是为了讲明性情与诗之关系的。关于此点，后文再论。

现代中文学术界对翁方纲诗学的研究起步颇早，虽然它最初是以“格调”和“神韵”的附庸而被发现的。1925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诗论》探讨渔洋的“神韵说”时，兼及翁方纲的“神韵”及“格调”论。铃木指翁方纲的“神韵”与渔洋不同，“格调即神韵”的说法是强辩，又说翁氏只对“格调”、“神韵”有表面理解，未能通达其涵义^⑥。40年代初，另一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他《清代文学评论史》一书，除了在“神韵说”的声调讨论提到翁方纲外，更另起一章“神韵、格调、性灵三诗说的余波”，将“翁方纲（覃溪）的肌理说”归入这个框架内，这时，翁氏诗论才得到较集中的探讨。青木主要利用翁方纲《格调论》三篇、《神韵论》三篇、《坳堂诗集序》及《石洲诗话》来说明翁氏的“格调”、“神韵”论述，这些文本亦为后来研究者最常引用。青木论述了翁方纲提出“肌理”是为了表示对李、王的“格调”和渔洋“神韵”狭隘之不满，故翁方纲的“神韵”是渔洋的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翁方纲传》第44册卷48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95页。

② 张维屏的评语见《国朝诗人征略》卷34，《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徐世昌、陶梁之评见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82，《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页。

③ 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④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⑤ 刘声木：《莪楚斋随笔》卷3，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页。

⑥ [日] 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洪顺隆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2—163页。

“神韵”再加上翁之“肌理”，即《石洲诗话》之“神理”。青木的研究初步勾勒出翁氏诗学的构建意图及特点，这是相当有意义的^①。

除了日本学者外，中国学者亦有提到翁方纲，不过具体以翁氏诗学为焦点的研究则要等到 40 年代才出现。在此之前，新诗运动底下，诗人曾对传统及西方诗学作出探索，钱钟书于 1937 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讨论英国女诗人薛德蕙（Edith Sitwell）的“texture”时，便说它与翁方纲的“肌理”义同。钱氏虽然只略谈“肌理”（钱氏这里的“肌理”只是广义的“肌理”，并未结合翁方纲的相关论述），但“肌理”的英文翻译却首见于此^②。不得不提，钱氏对翁方纲的“学人之诗”是极其反感的，他在《谈艺录》中狠批翁方纲不合称为诗人及学人^③。不过，对于翁方纲“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有于风致见神韵者，有在实际见神韵者，亦有虚处见神韵者，神韵实无不该之所”^④，却甚许之。钱钟书以“神韵”为“诗之最高境界”，当然不会认为“神韵”仅限于清虚冲淡一路^⑤。

沿铃木虎雄的思路，郭绍虞于 1937 年发表了《神韵与格调》一文^⑥。该文开篇即引用翁方纲《格调论》及《神韵论》的说法，以说明“格调”、“神韵”的重要。郭绍虞该文是将二说编派入严羽《沧浪诗话》的架构，以证明二说其实是“第一义之悟”及“透彻之悟”的分别。姑勿论其论证是否成立，但他力证二说在诗学上不是对立关系，只是侧重点不同。这和翁方纲之判断渔洋之“神韵”出自明人“格调”，以及二说可以在某个层面相通的思路相近。故有学人指出了郭氏此文与翁氏“神韵即格调”说的联系^⑦。不过，郭氏该文始终不是以翁方纲诗论为论述中心的。

① [日] 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9—145 页。

②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937 年第 1 卷第 4 期。

③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78 页。

④ 钱氏引翁方纲《神韵论下》的说法。翁文原为：“其实神韵无所不该，有于格调见神韵者，有于音节见神韵者，亦有于字句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有于实际见神韵者，亦有于虚处见神韵者，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情致见神韵者，非可执一以名之也。”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 8，第 35 卷影印本，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46 页。

⑤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40—41 页。

⑥ 该文发表于《燕京学报》1937 年第 22 期，后来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该文亦与另一篇名作《性灵说》结合成《中国诗的神韵格调及性灵说》，见台湾庄严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 张毅：《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博士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7 年，第 4 页。

翁方纲的“肌理说”得以“清代四大诗说”正名，是源于郭绍虞。郭氏于20世纪30年代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40年代编成及出版下册（1947年）。该书第五篇清代（下）的分章是“虞山诗派”、“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肌理说”首次被独立成一个部分，与其他几种诗说并列讨论^①。但郭氏采用较为宽阔的归类方法，“肌理说”一章除了首沿翁方纲，又将方东树、何绍基及同光体诸人，以至常州派之词论都归入“肌理说的余波”一节。在此之前（1946年），郭绍虞在《国文月刊》一连两期发表了《肌理说》一文，该文论述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抵相同，但在文首则有四说比较的一段话：

肌理说与神韵格调性灵三说有一大不同之点，即神韵等三说，都不始于清代，而是到清代，经渔洋、归愚、随园诸家之阐发，始得大成，而别立宗派的。至肌理之说，可说是始于清代。所以论神韵等三说可以溯其渊源，而肌理之说，则不重在渊源而重在影响。盖神韵格调性灵诸说一经论定，此后就难有嗣响，即使续有阐发亦不易度越前贤。独肌理之说则自翁氏覃溪拈举以后，影响所及，几披靡清季整个诗坛。这即是论述肌理说所应注意之点。^②

比起后来修改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此文欲确立“肌理说”于清代诸诗说的独特地位^③。该文认为方东树、何绍基及常州词派的理论都是沿着“肌理之旨”，这个判断后来作出修正，郭氏《中国文学批评史》转称这几家的诗学主张其实并不沿翁氏路子，他只是从有否受当时学风影响的角度而将之归进“肌理说”一章内讨论的^④。虽然这样，但清代四大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之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25—652页。

② 郭绍虞：《肌理说》，《国文月刊》1946年第43、44期合刊；郭绍虞该文后来亦收入《中国文学批评家与文学批评》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51—581页。

③ 《中国文学批评史》1979年版以家分节，四说统摄清代文论的意味相对减弱。

④ 郭绍虞自己亦云：“这（指张际亮的说法，张活跃时代稍后于翁氏）是很明显的与翁氏立异之处。所以翁氏之说，在事实上并未为一般人所信奉，而方东树诸人之诗论，也不是肌理说所能范围。然而我们仍称为肌理说之余波者，即因此种诗论与翁氏肌理之说同样都受当时学风之影响而已。”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38页。

诗说的论述框架基本上是从郭氏而来的。后来学人研究清代诗论，都视翁方纲的“肌理说”为清代诗论不可或缺的一块^①。1962年，周振甫出版《诗词例话》一书，其时只有“神韵说”，后来周氏在1979年修订时，增入了“格调说”、“性灵说”和“肌理说”，加上原来的“神韵说”，组成“文艺论”^②。由于该书介绍的四说皆是以清代四家立说，这就俨然有以它们概括清代甚至传统文艺论的意图。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修订本以“神韵”、“格调”、“性灵”及“肌理”为论述骨干，以“肌理说”为清中叶以后诗论的代表^③，遂几成定论。近年更有不少论文以“四大诗说”为题，脉络大致相同^④。

这样，研究翁方纲的框架大致设立，它的基本特征是：一、“肌理说”是清代四大诗说之一，它的代表人物是翁方纲；二、“肌理说”是在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发生及延续的；三、“肌理说”与“神韵说”、“格调说”关系最密，它是为了弥补二说的不足或弊病而提出的；四、“肌理说”以学为诗，取向近于宋诗；五、重视诗法，亦重视理；用郭绍虞的话便是“文理”与“义理”并重。后来的许多研究便基于这个

① 就以几部较流行的诗论专著言，如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七章“清代中期的诗论”便以“翁方纲、潘德舆”为一节，其中以探讨翁氏诗论为主。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十七章“清代前中期的诗词理论”内便有“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及“清代的词论”四节。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九章“集大成：清代文学批评”第五节“清代诗话四大学说”中，亦是“神韵”、“格论”、“性灵”及“肌理”。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清代前中期诗论”亦以“翁方纲”为其中一节。陈伯海、蒋哲伦主编，刘诚著：《中国诗学史·清代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亦以“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为“王朝兴盛与学术繁荣下的诗学（下）”的主要探讨对象。

② 周振甫在修订本“开头的话”提到该三说的增入部分是接受过钱钟书的意见的。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③ 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修订本，（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

④ 韩国的李哲理：《清代四大诗说论略》，《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2卷第6期。又《从清代四大诗说看清代诗歌特色》，《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1期。同名论文又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另外，袁进：《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框架，深化它各部分的内容^①。

台湾学者李丰楙的硕士论文《翁方纲及其诗论》（1974年），应该是当代研究翁氏层面最广的研究成果^②。翁方纲的生平、交游、著作，这些前人较少研究的范畴，李氏都下了功夫，甚至撰写了当代第一个翁方纲年谱。诗学方面，除了上文提过的既定框架外，李氏还有“翁方纲之批评方法”一章，提出翁方纲的批评是一种对作品的“细读”，并初步概括了翁氏常用之“细读”方法，如对诗题、字眼、句法、篇法之解读；他又率先利用翁方纲《杜诗附记》一书来研究前一节他概括出来的各种“细读”方法。此外，李文“翁方纲之体格、声律说”一章亦开辟了对这个范畴的研究。这都是李氏研究较前人研究周备之处，尤其在原始材料的应用上，更是前所未有。次年，李氏另一篇题为《翁方纲肌理说的理论及其应用》的论文，载于柯庆明编的《文学评论》第二集，此文是其硕士论文的精华版^③。

李丰楙的论文很快便得到了响应。李氏的大学同学古添洪，1976年于《中外文学》发表了《翁方纲肌理说与蓝森字质结构说之比较》一文。该文有关翁方纲“肌理说”的论述大抵基于李丰楙，但古氏却以之与美国新批评的重要人物蓝森（John Crowe Ransom）的“字质”（texture）和“结

① 敏泽以阶级角度析翁之“肌理”，尝试统合“神韵”、“格调”和“肌理”三说，见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3—922页。香港学者李锐清：《翁方纲“肌理说”的理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年第19期；亦载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选粹（1950—2000）·文学评论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304页。该文在此框架下，大量援引《苏斋笔记》的文本作论据。李氏尤重探究“肌理说”和“格调”、“神韵”之关系，其结论是“肌理说”是沈德潜“格调说”的翻版。黄保真、蔡仲翔、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分析了翁之“神韵”及“格调”，以及“文法”和“理”，论述颇详，引用文本亦较以往研究为多。不过该书是以颇持批判的态度来论述翁氏诗学的，认为翁氏论诗方法与诗之本质不合，是将诗学肤浅化。邹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以上提到的五个方面基本上都有涉及，而论析更详。张健《清代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五章“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理论的总结：翁方纲以宋诗为基点的诗学”，以更细致的分析，指出翁氏诗论如何立论于宋人诗论。

② 该文由成惕轩指导，写成于1974年，修订于1975年，并于1978年出版。《翁方纲及其诗论》，台湾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78年版。

③ 柯庆明编：《文学评论》第二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304页。后来宋如珊硕士论文《翁方纲诗学之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论述脉络与李氏该文大致相同，但在“肌理说之实际应用”更多利用《杜诗附记》的材料。

构”(structure)之理论比较。他将“肌理”拆成“肌”及“理”，前者相当于蓝森的“字质”，而后者相当于“结构”。透过对读，古氏发现翁氏诗论系统下，“诗本身不可‘意述’，换言之，就是不能以其他的陈述句来重述此诗”^①，也就是说诗歌在条分理析之下仍然保留着唯一的、不可完全复现的神秘部分。

翁方纲诗学研究的另一个开拓是“事境”。李丰楙的硕士论文已涉于此，但未有深论。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亦提到“事境”，并指它包括“政事”和“物境”，也就是从儒家诗说的立场下提出的^②。张健《清代诗学研究》亦阐明了“理味”与“事境”在翁氏诗学之重要性，“事境”与“诗境”相合便等于“切己切时切事”，与“实”之概念密不可分^③。张氏对“事境说”的探究意义不小，因其将讨论方向引导向虚与实、抒情与写实的思考，并以此说明其宋诗倾向的特点。

2000年以后，大陆、香港及台湾出现了几篇以翁方纲诗学为主题的学位论文，选题角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响应了前述既定的研究框架。先是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杨淑玲的硕士论文《翁方纲肌理说研究》（2002年），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阐释翁方纲如何融通“格调”及“神韵”，其指翁氏修正“格调”及补充“神韵”，以成“肌理”，较清晰地说明了翁氏“格调”“神韵”与此前的“格调”“神韵”有何不同^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学部何继文，在著名学者吴宏一指导下写成《翁方纲的宋诗学》博士论文（2003年），该文本着清代“宋诗学”的发展背景，论证翁氏诗学与这股“宗宋”潮流的关系，以及翁氏本人在宋诗特征、宋诗意义及宋诗大家诗法上的观点^⑤。台湾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研究所的黄婉甄的硕士论文《清代性情诗论研究》（2004年）亦沿以往四大诗说的提

① “意述”(Paraphrase)，古氏认为蓝森的系统，诗可以简化为“意述”，并据此以测量各字质，谓某些字质与此意述无关。古添洪：《翁方纲肌理说与蓝森字质结构说之比较》，《中外文学》1976年第5卷第2期。

② 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③ 后来陈善君有《翁方纲“事境说”初探》，《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卷第2期。该文尝试用“事境说”概括翁氏的“肌理说”，并说明“事境”可补“意境”之不足。

④ 杨淑玲：《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硕士论文，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2年。

⑤ 何继文：《翁方纲的宋诗学》，博士论文，香港城市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学部，2003年。

法，以“诗本性情”为研究前提，勾勒出清代四诗说如何在“性情论”下各有发明，但总体趋向共同的境界^①。暨南大学郑才林的硕士论文《翁方纲诗歌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研究》（2006年），则将焦点放在翁氏的诗歌创作如何体现其诗学主张^②。此外，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张然题为《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的博士论文（2007年），颇富问题意识，剖析了翁方纲面对渔洋“神韵”以及故人佳作时的矛盾态度，并探讨了此态度如何影响翁氏的诗论构建。另外，张然亦拈出翁氏诗学的精神在“学诗”，又以翁氏评点厉鹗及查慎行的诗来说明翁方纲针对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好诗”，而不是特定某种风格上的诗。该文另有一章探析翁方纲与苏轼的关系，以翁氏对《天际乌云帖》的考据功夫，指出翁氏并不坚守鉴定家和考据家的立场，只是致力证明自己和苏轼的精神联系，以抒一己之情^③。

乘着唐诗学的研究热潮，翁方纲亦被顾及，主要体现在选本研究上。南开大学韩胜的博士论文《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其中就有一节探讨翁氏的唐诗选本。他主要论述翁方纲编选的《唐人七律志彀集》、《唐五律偶钞》及《七言律诗钞》，前两部选本都为稀见古籍，鲜见于其他翁氏研究，故具有相当大的文献价值。韩胜比较这几部选本的选诗状况，论证了翁氏诗学有一个由独主唐音到由唐入宋的过程^④。2007年，贺严出版了《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一书，该书将翁方纲的论述置于“几种唐宋诗合选与唐宋诗之争的调和”一节下探讨，指翁方纲欲将唐、宋统一，找出二者的内在联系^⑤。

不少学者亦发现，翁方纲对杜甫尤其钟爱。李丰楙《翁方纲及其诗论》已就翁氏之论杜展开论述，后来宋如珊出版的硕士论文《翁方纲诗学之研究》亦同样以翁氏释杜来说明翁氏的“肌理论”。2002年，詹杭伦在《杜甫研究学刊》发表了《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以《杜诗附记》及《石洲诗话》为主要材料，描画了翁氏释杜的倾向及与诗法之关系^⑥。2006

① 黄婉甄：《清代性情诗论研究》，硕士论文，台湾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研究所，2004年。

② 郑才林：《翁方纲诗歌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研究》，硕士论文，暨南大学，2006年。

③ 张然：《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博士论文，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

④ 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博士论文，南开大学，2005年。

⑤ 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是其博士论文的修改稿。

⑥ 詹杭伦：《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